



领导干部
新视野

总主编/周文彰

服务型政府

社会合作治理新思维 (第二版)

FUWUXING ZHENGFU

SHEHUI HEZUO ZHILI XINSIWEI

石国亮 著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服务型政府

社会合作治理新思维（第二版）

FUWUXING ZHENGFU

SHEHUI HEZUO ZHILI XINSIWEI

石国亮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务型政府 / 石国亮著.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50-1053-3

I. ①服… II. ①石…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040号

书 名 服务型政府
作 者 石国亮
责任编辑 栗 钢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17)
(010)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编 辑 部 (010)6892878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053-3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本书销售专线:(010)62875265

领导干部新视野

编审委员会

总 主 编：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副总主编：余志捷（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主任）

陈炎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

执行主编：石国亮

编 委：	秦世才	范 文	乔仁毅	薄贵利	张占斌
	胡建森	刘 峰	龚维斌	王民忠	祝宝钟
	王光星	李福明	金 瑞	毛玉本	倪连山
	马志勇	朱 华	王 军	杨仲林	吴良仁
	陈 雄	陈春明	马殿平	赵 鹏	陶良虎
	徐晨光	马星光	陈林杰	彭京宜	唐青阳
	刘 毅	韩卫东	黄 顺	石俊华	张贵孝
	石玉亭	武伟生	杨国林	牟振江	赵柳成

总 序

周文彰

这套书系原名《新视野书系》，是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的领导和专家共同组织编写的，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管主办的研究出版社出版。多年来，这套书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许多培训机构选为培训教材。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我们对这套书系重新整理、改版，并不断策划组织新的选题，目的是将这套书系打造成面向党政干部的高端前沿读物，为干部教育培训、为建设学习型组织尽一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新思想，我们的视野比以往大大地开阔起来。眼界决定境界，

视野决定水平。各级党政干部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各项工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拓宽视野、开阔眼界、开放思维，创新工作方法。特别是要解决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问题。鉴于开阔视野对于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干部提高素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把“新视野”作为这套书系编写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一个重要指导原则，贯穿到编写全过程。我们提出的编写理念就是“当代视野，世界眼光，创新思维，前沿课题。”

新视野，最根本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新思潮、新观念、新知识、新成果。这套《领导干部新视野》在内容选择上力求突破以往的干部培训教材框架，及时反映领导科学以及各个领域的新进展，及时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对领导工作的新要求，着力跟踪前沿信息，服务现实需要，帮助广大干部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强化素质、提升能力。我们将这套书系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各级党政干部为主体的读者群，在内容和体例上也希望能够满足干部集中培训和干部业余阅读两种不同的要求。

非志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希望这套书系的出版，能给广大党政干部打开新的视野，在学习上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书系今后需要不断追求的目标。

这套书系的重新出版，由国家行政学院主导，同时得到了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及各省市党校和行政学院领导同志的关心和鼎力支持，得到了各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Contents

导 语 服务型政府是合作政府	1
第一章 政府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8
第一节 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8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定位	19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的探索与实践	28
第二章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	32
第一节 职能科学是前提	32
第二节 结构优化是重要保障	39
第三节 廉洁高效是关键	45
第四节 人民满意是评价标准和根本目的	51
第三章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55
第一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反思	55
第二节 “四个分开”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63
第三节 大部制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77
第四章 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	87
第一节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走法治化道路	88



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法制基础	98
第三节	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	106
第四节	依法行政是提高行政能力的关键	109
第五章	行政管理方式改革与创新	115
第一节	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式	115
第二节	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120
第三节	积极探索柔性化行政管理方式	133
第六章	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阳光政府	137
第一节	电子政务与政府创新	138
第二节	政务公开与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机制	143
第三节	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的法制化	152
第七章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162
第一节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	162
第二节	完善公共服务体制	171
第三节	改革公共服务的方式	178
第四节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83
第五节	公共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187
第八章	行政伦理与行政文化	192
第一节	行政文化是政府的灵魂	192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与服务行政伦理	196
第三节	服务行政伦理指导下的行政文化建设	201
第九章	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公务员队伍建设	207
第一节	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07

第二节	能力社会与公务员的职业能力建设	214
第三节	行政道德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219
第十章	在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28
第一节	有限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	228
第二节	社会自治条件下政府的职能	236
第三节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246
第四节	社会合作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前景展望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74

导 语 <<<

服务型政府是合作政府

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是借力社会变革而为自己开疆拓土的，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之中。这种历史性的转型迄今已经发生了两次，一次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另一次则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历史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每一次历史性的变迁都要求有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农业社会依靠严格的等级制度确立起来的是一种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依靠契约机制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依靠伦理德治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服务型治理模式，将这三种社会治理落实到政府管理实践中，就分别体现为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种行政形态。“服务行政社会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形态，而服务型政府是服务行政模式的实践形态。”^①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型政府，既是对传统行政模式的质的突破与超越，“它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做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做主’理念”^②，又是走向后工业化社会、寻求“善治”治理模式的必然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而走向服务型治理、建设服务型政府正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

政府管理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公共行政学已

^① 李传军：《管理主义的终结——服务型政府兴起的历史与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② 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载《行政论坛》2000年第4期。



成为一门全球性科学。尽管存在着多样化的差异，但各国已越来越在以下一点上达成共识：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求得生存和获得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权威、有能力、廉洁、勤政、务实的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合理、高效、规范的治理。但是，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服务型政府的认识和实践不可能是完全合拍的。或许有人会问：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何没能提出服务型政府这一构想呢？这是因为，作为工业时代最重要行政形态的官僚制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凭借其强大的层级节制、非人格化、科学化、技术化等优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政府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而基于官僚制建构起来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政府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其发达工业文明背后的“幕后英雄”。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官僚制的道路，并对这样的一种政府理论和实践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当然，面对管理型政府存在的诸多弊端，西方发达国家也尝试着探索政府改良的方案。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政府改革的季节，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持续不懈地致力于改革政府。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新公共管理理论几乎成了改革的“圣经”，很多国家都是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出的药方去进行改革的。然而，他们很难也始终未能跳出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维框架，他们所提出的所谓“改革政府”“有限政府”“善治政府”“绩效政府”“无缝隙政府”等名称繁多的政府形态，都不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尽管他们带有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色彩，但仍未能超越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范畴，而他们所谋求的是体制以下的技术性方面的改进实践，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对管理型政府的超越，去开辟一条新路。

与之恰恰相反，中国迄今尚处在完工业化进程之中，所谓后工业化的迹象充其量也只是在深圳、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有所显露。那么，处于这一阶段的中国又为何能够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呢？中国的行政改革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西方国家的改革进程大致同期开始，但是在行政改革的起点上却大为不同。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建立在官僚制发育不足的基础上的，为此，有人提出中国不应当模仿西方的行政改革，而应当首先发展官僚制。但是要根据官僚制既有的原则去构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是不可行

的，因为如果在中国的行政改革实现了官僚制构建，那么，在未来的中国，官僚制所具有的根本性缺陷，将成为中国未来行政改革的难题。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行政改革应当具有世界性的眼光，选择一条有可能直接超越官僚制的道路。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工业文明就显得滞后了很多，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政府在中国留下的印迹并不深刻，所以，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身上所背负的思维包袱，可以大胆地闯、勇敢地试。其次，“公共行政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源。”^①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管理和治理的成效如何，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影响，中国政府带有极为浓厚的“全能主义”色彩，对很多领域和事务大包大揽，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一种全新且带有根本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讲，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特殊的国情“逼”出来的。再次，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是公共行政学诞生的前提条件。但是，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在政治和行政尚未完全分化的情境下展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行政体制改革往往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前面，即谋政治体制改革之事，行行政体制改革之实。而“我国改革开放来的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是从政治体制的实际需求和反应来展开的”^②。大体而言，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机构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更多地属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大以后，机构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政治议题的特征显现了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改革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进入了全面行政改革的更深水域。此时，“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的议题就被提了出来，超越官僚制就成了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构想就是基于这一逻辑提出来的。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形态，服务型政府有哪些本质特征呢？对此，专家们莫衷一是，理论界尚无定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府。持此观点者将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界定为公民本位和社会

① [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于同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② 石国亮：《回声与超越：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载《行政论坛》2012年第1期。

本位的服务价值理念的培育和塑造,强调服务理念的核心性和民意的主导性。刘熙瑞认为:“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府体系,其差别的核心之点在于:究竟是官本位还是民本位?究竟是政府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究竟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①并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吴敬琏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将被“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政府。^②其二,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是法治政府。傅思明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它必须依法产生、受法律约束、依法律办事、对法律负责。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③其三,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是责任政府。王丽丽、徐军田认为:“责任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的最基本的内涵之一,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政府责任约束机制,政府行为就可能偏离为民服务的轨道,而走向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引发权力腐败。”^④此外,研究者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应当是廉洁政府、高效政府、透明政府,等等。这些观点和看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服务型政府的特征,深化了对服务型政府的认识。若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的话,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合作”二字,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合作政府,合作治理是服务型政府区别于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的最为本质的属性特征和价值取向。

当代哲学家冯契认为:“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也是对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组成部分。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据,在方法论上就有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⑤如若将合作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关系问题置入历史的坐标系中来审视,我们发现,服务型政府的兴起与演进是与合作政府的出现与发展同频共振的。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

①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② 参见吴敬琏:《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载《领导决策信息》2003年第25期。

③ 傅思明:《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刍议》,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1期。

④ 王丽丽、徐军田:《服务型政府内涵探析》,载《前沿》2007年第2期。

⑤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页。

是一部合作的历史。但是，在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模式下，人类的合作表现为一种初步的互助，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治理复杂性偏低及人们沟通方式的有限性等多种因素相联系的。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在较低水平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框架下，人类的合作异化为一种协作，而层级节制、层层支配体制下的有限分工与协作成了管理型政府的重要表征。官僚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协作体系。步入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袭来，人类进入一种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社会越发地凸显出一种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形势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超越协作治理的合作体系，这是因为：“从人的行为来看，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协作体系的不足，往往回归到用人类早期应对危机的互助型行为方式去应对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不过，在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之后，我们意识到合作的价值，倡导世界各国通过合作以应对这场经济危机。”^① 特别是以20世纪后期的全球结社革命为代表，蓬勃兴起的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治理活动之中，使得原有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更多地被政府与社会多元治理合作治理的模式所替代。正如美国学者帕特南所认为的那样：“自愿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个人无法创造的价值，无论这些个人多么富有，多么精明。在公民共同体中，公民组织蓬勃发展，人们参与多种社会活动，遍及共同体生活各个领域。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② 这种合作治理模式是与服务型治理模式相伴而生的，它将原来的官僚制政府改造为一种合作政府，而基于服务型治理模式产生的服务型政府的最大特征无疑就是“合作”二字。

从政府职能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者，另一个则是公民利益的服务者，而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的一项必备职能，同时也理应成为服务型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可以说，公共服务职能的产生是与公共领域

① 张康之：《论超越了协作体系的合作体系》，载《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

② [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与私人领域的两分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面向私人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领域分离逐渐转向领域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加之公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愈加高涨、日趋多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原来的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之重，寻求一种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疑迫在眉睫，以多中心治理、多元治理为核心旨归的合作治理理念恰恰顺应并迎合了这一趋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著名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她看来，所有的公共当局具有有限但独立的官方地位，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作为最终的或全能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它就打破了单中心制度中最高权威只有一个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基于这一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她从公益物品的性质出发，在公共领域发展出了类市场的结构安排，形成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合作治理的格局。而对于这一多中心治理格局如何协调并维持秩序，奥斯特罗姆认为，“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多组织安排得以协调，它们包括护理型的贸易和协议、竞争性的对抗、裁定冲突以及有限等级的命令权力”^①。这种协调模式，恰恰反映了一种合作的精神。凭借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以从事政治学研究为主业的奥斯特罗姆破天荒地荣获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这足见多中心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价值，而且也凸显了合作治理之于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意蕴。换言之，服务型政府就是一种以“服务—信任—合作”为主导社会治理机制的合作政府。

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来看，自200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起，近十年来，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有力印证了合作治理之于服务型政府的意蕴与价值。仅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最新实践来说，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① [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6页。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强调要公平对待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每一步实践的脚步都无不透露出一种多元治理、多方参与、简政放权、提升效率的合作治理的政策讯号，合作治理理念开始迈入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并且已经展现出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服务型政府是合作政府，这一论断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入了“治理”这一新的概念，先后出现了24次。该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强调“有效的政府治理”，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这些都是重大的理论观点，也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它从理论上、政策上确立了多元合作治理的根基，标志着合作治理正式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方向。

正是基于上面的分析和判断，本书将副标题命名为“社会合作治理新思维”。就是说，本书是从社会合作治理的角度来把握和研究服务型政府的。全书由导论和十章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和关系是：第一章是总论，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视角出发，就服务型政府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及战略定位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在系统总结和梳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改革期望。第二章重点介绍和分析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目标，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这四大目标。从第三章到第十章，重点探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其中，第三章到第九章则重点围绕改革行政体制、推进依法行政、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阳光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行政伦理与行政文化、建设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公务员队伍等六个方面，就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具体战略和路径展开论述；第十章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并对社会合作治理空间的拓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第一章 <<<

政府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机构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更多地属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大以后，机构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政治议题的特征显现了出来。对于行政改革，我们需要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而是需要进行全面的创新，既包括政治层面的创新，也包括技术层面的创新，其中，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切入点。服务型政府建设意味着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超越。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将建立起一个以政府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必然选择。

第一节 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一些有着远见卓识的学者敏锐地洞察到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式上的有益探索，并积极地去探索我国政府改革的未来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反映在“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提出上，特别是经过了几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看到，服务型政府理论化正在系统化。在现代政治环境中，